



革命斗争回忆录

毛主席在重庆

吴玉章 龙飞虎等著

毛主席在重庆

吳玉章 龙飞虎等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61·北京

毛主席在重庆

吴玉章 龙飞虎等著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 旗坛寺一号

北京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4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

南京 湖岸路十三号

江苏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4 1/16 字数 76,000 字

1961年4月第一版

196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南京：1—50,000

3F76/33
內 容 提 要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件大事。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我們從各報刊上選輯了一些記述解放戰爭時期革命鬥爭生活的回憶錄，按戰爭發展階段分編為五個集子：《毛主席在重慶》、《英明的預見》、《千里躍進逐鹿中原》、《偉大的戰略決戰》、《蔣家王朝的復滅》。

本書——《毛主席在重慶》共選編了九篇文章，內容是揭露國民黨反動頭子蔣介石於日本投降後，如何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玩弄和平陰謀，積極準備發動內戰；歌頌毛主席如何領導全國人民，為保衛抗戰勝利果實，爭取國內和平，與美蔣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這些文章可以幫助我們認清美蔣反動派的丑惡面目，幫助我們深刻體會毛主席用革命的兩手回擊反革命的兩手的偉大而英明的思想。

封面設計：董隔章
陳德弘

目 录

美蔣和平陰謀的破产	吳玉章	1
毛主席在重庆	龙飞虎	32
針鋒相对的斗争	王敏昭	38
惜別四明	譚啓龙	46
剝去美軍的画皮	仲曦东	52
在“中立調处”的外衣下	辛 毅	66
古北口保衛战	曾 美	80
針鋒相对 寸土必爭	陈正湘	92
第一个春天	梁必业	104

美蔣和平陰謀的破產

——解放戰爭初期的一段回憶

吳玉章

還在抗日戰爭后期，美帝國主義即加緊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妄圖在戰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蔣介石依靠了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不積極準備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復國土；却處心積慮地在那里布置陰謀，準備內戰，坐待勝利到來之時，好從峨眉山上下殺下來，一舉把共產黨、解放軍消滅，以恢復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動統治。對於蔣介石的反動陰謀，中國共產黨早已洞若觀火。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即曾發出了嚴重的警告：“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日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〇五二頁

宣战。在苏联紅軍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該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軍“应就原地駐防待命”，不許解放軍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以待蔣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蔣日合作与蔣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灭。

但是，由于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經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經拥有一亿以上的人口；解放軍已發展到一百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經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針，毛澤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中，提出了“針鋒相对，寸土必爭”的革命方針。根据这一方針，我們一方面要力爭和平，反对內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發動全国規模內战的反革命計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說，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衛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針，而这时国

內人民和国际輿論又都反对蔣介石进行內战,同时蔣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內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時間,以便把更大量的軍隊运到內战前綫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陰謀。于是,这个靠內战起家、双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居然装扮成和平妖怪,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一連發出三次电报,邀請毛澤东同志去重慶談判“和平”。这分明是要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澤东同志認為:为了尽一切可能爭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的陰謀,以團結和教育广大人民;我們應該去。如果我們不去,就恰中了蔣介石的詭計,他正是希望我們不去,以便借此說我們拒絕和平,發動內战。因此,毛澤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慶。听说毛主席要去重慶,延安的广大軍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許多“鴻門宴”之类的事情,而蔣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①,人們記憶犹新,人們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沒有根据的。但是,毛澤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認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蔣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湯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澤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瀾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說:“請告訴毛主席,我們劝他千万別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轉告了范老夫婦的意見,毛澤东同志笑了一笑,說道:“謝謝他們的好意,

① 一九二九年蔣桂軍閥战争前夕,蔣介石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湯山。一九三一年因所謂“約法”問題的爭執,胡汉民亦在湯山遭蔣軟禁。

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澤东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澤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滿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許多人為此感动得流泪。柳亞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詩章^①。善良的人們是如此渴望和平，他們哪里知道蔣介石的葫蘆里装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藥。

毛澤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談判毫无准备，所以我們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蔣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談，但他們对談判并無誠意，只不过成天地虛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他們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澤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發他在一九三三年所編写的罪恶手冊——“剿匪手本”。九月十七日，蔣介石又密令送發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繳获）。同时，国民党軍閥錫山部对我晋冀魯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九月間就开始了。

① 柳亞子的詩写道：“關別羊城十九秋，重遙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氣能格，遍地勞民战尚休。霖雨蒼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侖頂上头。”

經過四十多天嚴肅的談判鬥爭，蔣介石迫於國內外的形勢，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黨提出的和平團結的方針，不得不虛偽地同意結束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黨派平等合法地位、嚴禁特務活動、釋放政治犯、積極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減全國軍隊、嚴懲漢奸、解散偽軍等主張。所有這些，都寫在國共兩黨代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簽訂的“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上面。這有什麼好處呢？毛澤東同志說：“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為了爭取和平，為了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間人士的同情，以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污蔑，我黨在談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讓步。我們同意讓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個解放區；同意按比例縮編我們的軍隊，如果國民黨真的肯把它的軍隊縮編為一百二十個師的話，那末我們可以把解放軍縮編為二十個師，只占全國軍隊的七分之一。但是，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根本消滅解放區和解放軍，因此關於解放區政權和軍隊的問題，始終未能達成協議。重慶談判的經驗再次證明，政權和軍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因而成為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焦點。誰如果忘記了這一條，誰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由上可見，我黨在談判中雖然作了一些讓步，但這些讓步都是有原則的，並無損於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我黨則不懼任何威脅，始終堅定不移，

毫不退讓。而且，在談判期間，我們絲毫沒有放鬆警惕，我們對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作了必要的準備。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少奇同志（他當時代理主席的職務）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隊調往北方，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一旦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被敵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這個意見在征得毛澤東同志的同意後實行了。這時，我們在解放區，尤其是新解放區，正放手發動群眾，由反奸反霸而減租清算，群眾運動在轟轟烈烈地開展，有的地方，農民甚至自發地起來解決土地問題。這樣，自日本投降後，解放區不但迅速地擴大了，而且從根本上鞏固起來了。正因為我們一方面參加和談，一方面又準備自衛，我們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雙十協定”雖然簽訂了，但蔣介石絲毫也不打算遵守。“雙十協定”於十月十二日公布，十三日蔣介石就對其部下頒發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將領，要遵照他所訂的所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對解放區“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這就是說，他已下令對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但是，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在解放區軍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敗。十月中旬，進攻我上黨地區的閻錫山部國民黨軍三萬餘人被我們全部歼滅，連其指揮官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等許多高級將領皆被我們俘虜。這就是著名的上黨戰役。十月底，我們在規模更大的平漢戰役中，在邯鄲地區消滅了沿平漢綫進犯我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國民黨軍七萬餘人，其高級將領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八軍軍

長高樹勛于戰場舉行起義；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等人則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區軍民的勝利也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反內戰運動的高漲。十一月十九日，重慶各界成立了反對內戰聯合會。二十五日，昆明舉行了盛大的反內戰集會，由於國民黨反動軍警的橫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數萬學生的總罷課。至十二月一日，便發生了舉世轟動的“一二·一”慘案。接着，全國各地都爆發了為援助昆明學生的遊行示威，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反內戰運動，一時席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

中國人民反對內戰的堅決鬥爭，迫使美帝國主義不得不改換其干涉中國內政的手法。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國政府宣布調回其臭名昭著的駐華大使赫爾利，另派馬歇爾以特使名義來華“調停”中國內戰。很顯然，美帝國主義妄圖親自出馬，指揮着蔣介石國民黨來共同導演一出“和平”的活劇。就是在此種情況下，在十二月於莫斯科舉行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上，美國才同意了蘇聯一再堅持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

由於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區軍民自衛戰爭的勝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反內戰運動的高漲和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特別是由於第一方面的原因，蔣介石才被迫同意召開“雙十協定”中規定的政治協商會議。

我黨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鄧穎超和我，共七人。這時董必武同志已在重慶。（葉劍英同志後來參加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

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們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六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經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統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聖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滿了无限的感慨。

我們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須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軍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們的主張。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規定这一命令于十三日起生效。但是，蔣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搶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証明了蔣介石絕不肯真心停止內战，只不过是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內战的烟幕罢了。

与發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會議也于一月十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會議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極為复杂，大致說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主張推翻国民党的一党專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專政的法西斯統治；中間派也可以說是改良派，它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專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間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

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屬於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間派居多数。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團結中間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會議和許多次分組會議。（分組会有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組。）無論在全体會議上和分組會議里，都充滿了斗争。爭論的焦点仍然是軍隊問題和政权問題，即所謂軍隊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問題。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軍隊国家化”的問題，說什么必須先有軍隊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圖以“民主”作釣餌，来勾去人民的軍隊。針对着蔣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軍隊国家化，必須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軍隊民主化。即是說，要把国民党一党專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蔣介石私人軍閥的軍隊变为人民的軍隊。在这两条原則的尖銳斗争中，有些中間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們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軍隊，由他們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們的幻想終於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問題，爭論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願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員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願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

表仍然有效和所謂“五五憲草”的基礎上，作點換湯不換藥的改變；不僅如此，它甚至妄圖在“統一國家主權”的名義下，把解放區一口吞掉。針對着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我黨一方面堅持要實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選省長，自制省憲，以此來保障解放區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面則要求把國民黨反動政府改組為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並且要在它的領導之下，召集真正的國民大會和制定真正民主的憲法，以此來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為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創造一些條件。在這個問題上，某些中間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員的分配以及什麼總統制、內閣制之類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爭的是舊民主主義和個人的地位，並不是新民主主義和人民的利益。

經過一場尖銳的鬥爭，政治協商會議終於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等五項決議案。這些決議，雖然離我黨的要求還很遠，但卻在不同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政協會議的召開和政協決議的公布，使全國人民特別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歡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為中國從此即將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其實蔣介石只不過是利用政協來進行和平欺騙，以配合他這時正在那裡進行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準備。

對於蔣介石的一切，我黨從來不抱任何的幻想。蔣介石曾在政協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了所謂給人民自由權利、各黨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釋放政治犯等四項諾言。

在要求国民党釋放我們被捕同志的時候，我們曾反復考慮，是開出一大堆的名單好呢，還是只提出個別的同志？我們估計到國民黨的反動性，認為把某些同志提出來，不僅不能使他們得救，甚至反而會引起國民黨對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們的危險。因此，我們最後只提出了廖承志和葉挺兩位同志。此外，我們還提出要釋放張學良將軍。果然不出所料，國民黨雖然懼於全國的輿論和我黨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葉挺同志放了出來，而對其他同志則一個也不放。甚至連張學良將軍（雖然當時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釋放張學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釋放。所謂釋放政治犯，原來是一個騙局。

還在政協會議開會期間，國民黨特務就開始了對政協的破壞活動，滄白堂事件^①和搜查民盟代表黃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這時發生的。而當政協會議閉幕後，二月十日，重慶各界人民正興高采烈地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成功的大會時，國民黨特務卻大打出手，在會場上打傷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餘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較場口事件。接着，二十二日，國民黨反動派又無耻地在重慶製造反蘇遊行，組織特務流氓搗毀了我《新華日報》營業部，並把我們的工作人員楊黎原等同志打得遍體鱗傷。與此同時，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營業部也遭到特務的搗毀。類似的挑釁

① 政治協商會議進行期間，重慶各界人士每晚在滄白堂集會，听取政協代表報告開會情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國民黨特務曾多次搗亂會場。人們把這稱為滄白堂事件。

事件，一時曾遍及國民黨統治區。所有這些，都證明國民黨已蓄意撕毀政協決議。果然，在三月上半月召開的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就公開聲明，對政協決議要“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就是說要從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毀。三月下旬至四月初，國民黨又召開了它御用的國民參政會的四屆二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蔣介石發表了又長又臭的演說，大彈其反動透頂的法西斯的法統論之老調，表示要堅決撕毀政協決議和三月二十七日剛訂立的東北停戰協議。至此，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已經昭然若揭了。

蔣介石這一套陰謀詭計，都是在美帝國主義的導演下進行的。美帝國主義一面用各種方法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特別是用海軍把大量的國民黨軍運到了內戰前綫；一面却裝作“和事佬”來進行“調處”。馬歇爾一開始就只主張在關內停戰，不主張關外也停戰，他和蔣介石一樣，妄圖讓國民黨軍占領東北後，再集中力量到關內來消滅我們。當時設立在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和它派出的執行小組，雖然是由美、蔣和我們三方面組成的，但美國人總是站在蔣介石方面，拿“調處”來為蔣介石的軍事服務。哪里對國民黨的軍事不利，執行小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軍的前進，和挽救國民黨軍的失敗；而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時，執行部却故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調處，以便國民黨軍放手進攻，取得某些軍事上的便宜。美帝國主義的這套把戲，一時確曾欺騙了一部分人，特別是某些所謂中間人士。但到後來，它的馬腳就逐漸露出來了。